

离开故乡许多年后,再次与童年时代的“红娘子”相遇。

那是盛夏的一个下午。讨厌的黄梅天终于结束了,我把书橱里的书搬到院子里晒一晒霉,随手抄起一本,坐在廊檐下消磨时光。不经意间,“红娘子”从书页中飞出来。原来,我浏览的是王实甫的古典戏剧剧本《西厢记》。

书中有这样一段含蓄的唱词:

“桂花”摇影夜深沉,  
酸醋“当归”浸。  
忌的是“知母”未寝,  
怕的是“红娘”撒心。

稍有点中医常识的人不难明了,这段戏文中的“桂花”“当归”“知母”,皆为中药材;其中的“红娘”,并非为少男少女牵红线的媒婆,而是一种小虫子,老家叫它“红娘子”,也是一味中药。少年的我,曾跟它打过交道。这种虫子,不仅名字充满诗意和美感,其神形也似一位带有某种巫气的诗人,曾经让我着迷。

《本草纲目》对红娘子有着毕肖的描绘:“此物初生,头方而扁,尖喙向下。蟋蟀之类,有翅数重,上翅黑色,下翅正赤,六月飞而振翅有声。味苦,平,有小毒,不可近目。”

就是这种小虫子,时隔几十年,无意中被我旧书里翻了出来,依然栩栩如生。

我的皖东老家皇甫山一带,丘陵起伏,灌木丛生,山边地角,河畔渠旁,生长着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草药:天冬、半夏、苍术、紫花地丁、龙胆草、沙参、半边莲、鬼箭羽、红茜、柴胡……当然少不了红娘子——带着某种巫气的小虫子,更是一味珍稀的中药。

六月,正是栀子花开麦子黄的时节,丰沛的雨水使自然界的万物充满生机,我们的红娘子就在这个时候出现。它身着黑色长裙,低垂着瘦长的苦脸,颇有点近似于古装戏里以水袖掩面、神情忧惧的冤妇。它自轻自贱,有高枝而不栖,总以低矮的灌木为伍,多半时候伏在叶片的背面,犹抱琵琶似地露出半张凄婉的粉脸。

第一次失业,是那个坐落于山中的生产碳化砖的地方国营企业破产倒闭,我回到父母的身边,等待劳动部门重新安排工作,每个月可领35元生活费。从1986年5月到1987年11月,这漫长的失业时间,我只能靠读书来打发。本街一个姓汪的退伍军人带回了几百部书,由他母亲摆摊供人借阅,一本书一天只收5分钱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主,我以前没有读过的,差不多都借阅了,并将书中精彩的段落、句子抄录下来。

这一年半的失业,是我第一个读书高峰期,法国、英国、俄国及前苏联的一些世界级的大作家的代表作,国内出版的都涉猎了,《复活》看了两遍,佩服托尔斯泰,他的小说为我呈现了一种陌生的深邃的人文世界和精神版图。厚厚四册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是我抄录格言、警句最多的一部小说,超过了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对我心灵的撞击,竟然对于正处于青春认同“哪个男儿不钟情”的我,更具有感染力与影响力——激励我自学成才,成为一名作家。多年后,我将

这次读书经历,写了一篇文章《亮堂里读书》,参加在山东举办的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征文比赛,获得了一等奖。

时间更长的一次失业,是2000年3月至2002年8月,达两年半时间。在此之前的1998年也失业了一年。为什么我老是失业,并且一失业就那么长时间?这其中,主要是身份、体制、经济和环境等综合因素造成的。单位集资建房,我背了一身债,靠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一时很难卸担,于是1998年

## 红娘子

许俊文



春意 李陶 摄

六七岁时,我经常一个人跑出村庄,拐过一道爬满葛藤、蜻蜓花(金银花)的红土墙,一大片墓地便出现在眼前。那里有我爱吃的野草莓和小麦果,它们比麦黄杏、桃子、桑果更诱人。诚然,那里也是红娘子最多的地方,每一株矮小的蓼棵上都趴着好几只。我提着小胆子走过去,近距离地打量着红娘子。或许早晨的雾气太重,趴在蓼棵上的红娘子,将尖喙插入晶莹、饱满的露珠,身体轻

轻地颤抖着,偶尔发出“叽、叽、叽”的低吟,有点像巫师含混不清的咒语。

太阳渐渐爬升起来,预热的光芒驱散了笼罩在墓地上的雾气。此时晾干翅膀的红娘子,身体变得轻盈,开始三三两两地飞动。它们飞过的地方,空气中仿佛弥散着幽冥的气息。于是,我动了捕捉的念头,屏住呼吸,把手慢慢地伸向一只红娘子,在接近目标时,指尖猛地一捏。红娘子不像豆娘那么温顺、柔弱,它使劲地扑动着翅膀,就势将一泡尿撒在我的手上,算是对我的抵抗与报复。过不了一会儿,我用沾着红娘子尿液的手抹脸,眼睛立刻就红肿起来。就在我无所适从时,成千上万只红娘子突然飞舞、鸣叫起来,给墓地蒙上一层阴森、恐怖的气氛,吓得我脊背发凉,拔腿就往村里跑。

捕捉红娘子是一件轻巧活,多半是村里的那些大孩子和老婆婆。他们趁着晨露未干,一个个手里提着布袋,撒向一面面山坡。我担心他们把红娘子捉完了,来年不会再有。豆青山上的柴胡、白头翁就是,挖一棵,少一棵,最后彻底消失了。还有开紫花的猫耳朵,一长一大片,三年不到就挖绝了种。

那些生长缓慢的植物,需要很多年才能繁衍成一个小群落。红娘子不,它们长着翅膀,又躲藏在蓼叶背面,任你捉,总会有“漏网之鱼”;再说,它们会把卵埋在蓼棵的皮层里,第二年的夏天照样多得是。

人们把捉回来的红娘子,用开水烫死,晒干,出售给小镇上的药材收购站,换回一张张零票子,缴学费、打煤油、买盐;再多一点,扯块布料,做件新褂、新裤子。

比我大几岁的姐姐,是捕捉红娘子的高手,她每次从山上回来,布袋总是鼓鼓的。她教我怎么烫红娘子,我躲得远远的,害怕听到红娘子集体临死前那凄惨、绝望的哀鸣声。不过,当她卖掉红娘子从小镇上回来时,不是送给我一串糖葫芦,就是几颗水果糖,我吃得沥拉着口水,早把红娘子忘得一干二净。

红娘子是什么时候彻底绝迹了呢?不得而知。如今,我那童年的小虫子,只能在旧书中寻觅了。

## 转“业”读书

何诚斌

春节后放弃中型水泥企业的机关工作,停薪留职去广东“发财”,结果一踏上惠州就被人骗进了传销组织。周旋数日,机智地脱身后,挤绿皮火车狼狈而归。我觉得是一种耻辱,无脸面见人。什么家务活都不干,一天到晚读书——先是消极地躲进文字中,接着通过语言疗伤,平复心情,然后走出家门,为了生计,不管他人的眼色,毅然接受矿山苦脏累的工作。一年后,企业困难重重,实行减员增效,将一部分工人送到市“下岗中心”。我所在的矿山车间,谁留谁走,采取投票的方式决定。我见几个老工人神情戚然,唉声叹气,甚是同情他们,便为自己投了一张下岗票。

又去了一趟广东,在东莞跑了几个镇的工业园区,没有找到工作,主要是由于有抵触、为难心理,不想去工厂流水线吃苦,而三十多年龄偏大,文员、主管等职位又应聘不了,尽管身揣大专学历证书和作家证。南方蚊虫多,个头大,受其叮咬很难受,加上水土不服闹肚子,几天后犯起“思乡病”,欲罢不能,便又拎着行李包,千里颠簸,打道回府。这次再也不能回到原国企,便吃起每月195元的下岗费。因为有一位市里领导答应给我介绍工作,我于是就指望他了,过起了逍遥的读书生活。这时我已积累不少书,摆满三个书橱,将没有读过的书全读了,然后重读经典,主要是西方文学、哲学、美学著作。我日日只顾读书,家中藏书已满足不了我的需求,便失去理智地将下岗生活费也用来购买新书。因报纸副刊繁荣,散文比小说好发表,我在写作的同时,读了大量散文作品。妻

子很急,便催她妈去那个当市领导的老家打听消息。岳母一次次去,对方一次次说等机会、候消息、不要急,分明表示愿意帮忙。结果,一月复一月,一年又一年,我在等待佳音中读了几百本书,写了几百篇文章。他像一盏在黑夜中忽明忽暗的灯,暗的时候我在书海泅渡,亮的时候我以为马上到岸了,可光线一闪而逝,又是一片黑暗。直到2002年9月,由退休教师李智海先生推荐,我到县地方志办公室上班,参与编修县志,再次就业。

接下来的二十余年,从下岗工人到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置换,我干过不少种类的工作,其间仍出现过失业、半失业,但总体上经济不拮据、日子不发愁了。2015年4月至6月失业,2016年8月至10月失业,2021年4月至2022年11月失业。这三次失业,我读了一些中国的“经史子集”等文献,“桐城派”代表作家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的文集,带有研究性地细读了一遍,并由此买了与他们有过交集的文人的书籍,又读阳湖派的作品、公安派的作品、东林党人的著作,等等。以岳麓书社、黄山书社、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古籍版本居多。平时是碎片化阅读,而失业后集中大块时间阅读,好不痛快。我读传统文献,还有一个文化基因、或者内在精神的原因,就是人到中年后,更容易在老祖宗留下的文字中遇到心灵契合的东西,或许是时代变了而思维方式没有变、社会关系变了而人设没有变、工作内容变了而人文背景没有变吧。

除了失业时时间充足,半失业时也是时间富裕。所谓灵活就业者,经常貌似在上班,实则没多少活干,闲着无聊,那就转“业”读书吧;貌似无班可上,实则偶尔接点写材料的活儿挣生活费,也就二“业”转换、边做边读书吧。如此这般,书越读越多,而愈加受控于书,倾向于“儒者多文为富”的价值观,不理经济,一介平民地活着。这一辈子,只能如此了。

